

“澄以石虎为海鸥鸟”新解

——兼谈佛图澄与石氏关系的意义及影响

徐 菲 丁宏武

提 要：历来学者们对《世说新语·言语》第四十五则林公之意解说有较大分歧，文章通过分析《世说新语》所载此条文本用词、用典及支道林本意来得出新解，并兼谈佛图澄与石氏关系对佛教在东土发展初期的意义及影响。

徐菲，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丁宏武，文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关键词：佛图澄 海鸥鸟 石氏 机心

《世说新语·言语》第四十五则：“佛图澄与诸石游，林公曰：‘澄以石虎为海鸥鸟。’”此句言约旨远，机锋暗藏。因此，历来学者对林公所言旨归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鉴于此，笔者拟从《世说新语》所载此条文本用词、用典及佛图澄与石氏的微妙关系发微探秘，以期对林公本意有更为深入、准确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管窥佛图澄与石氏交往中的宗教活动对佛教扎根东土的意义及影响。

一、各注家分歧简析

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①和杨勇《世说新语校笺》^②均未作解释。徐震堉《世说新语校笺》与《世说新语辞典》的解释基本相同，前者说：

刘辰翁曰：“谓玩虎于掌中耳。”案此说未允。

盖谓澄以无心应物，故物我相忘也。^③

后者云：

此处暗指佛图澄清净无机心，物我相忘。^④

萧艾《白话世说新语》释为：

澄和尚把石虎当作海鸥鸟（狎玩）。^⑤

张永言先生据慧皎《高僧传》及《晋书》所载佛图澄事分析认为，澄以西域高僧远适后赵弘法，处乱国，值暴君，盖无时不小心翼翼，有临深履薄之感，常常借“神异”“艺术”自饰，以立身行道。且以《高僧传》所云环境险恶、形势严峻及澄与异人麻襦密谈时所说的“久游闻浮利，扰扰多此患”一言，印证佛图澄的忧患意识十分深沉，深怀戒惧、时时处处都很有心机^⑥。进而否定徐震堉、萧艾等众说，肯定美国学者芮沃寿（Arthur F. Wright）的解释：

这个故事的要点是海鸥鸟被设想为能觉察威胁而相应改变行为，所以支道林的意思是佛图澄在他与石氏的关系中把他们认作具有野性和警惕性的鸟类——不是很聪明，但善能察觉他（佛图澄）这一方的任何不忠，如同《庄子》故事中的鸥鸟那样。^⑦张永言先生在评述各家注解的粗略失当方面不无道

理，但是，说佛图澄深怀戒惧、有临深履薄之感，借“神异”“艺术”自饰，以立身行道的提法还应修正补充。笔者认为，佛图澄借“神异”“艺术”行道是事实，借“神异”“艺术”自饰、立身乃因其深怀戒惧、有临深履薄之感则有失公允。其实，佛教在传入中国的前期阶段，高僧借“神异”“艺术”传道是十分普遍的现象，《晋书》载僧涉、鸠摩罗什、昙霍皆是这方面的实例：

僧涉者，西域人也，不知何姓。少为沙门，苻坚时入长安。虚静服气，不食五谷，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验若指掌。能以秘祝下神龙，每旱，坚常使之咒龙请雨。俄而龙下钵中，天辄大雨，坚及群臣就钵观之。^⑧

什乃聚针盈钵，引诸僧谓之曰：“若能见效食此者，乃可蓄室耳。”因举匕进针，与常食不别。^⑨

（昙霍）行步如风云，言人死生贵贱，无毫厘之差。人或藏其锡杖，昙霍大哭数声，闭目须臾，起而取之，咸奇其神异，莫能测也。^⑩

除《晋书》所载之外，《高僧传》、《佛国记》、《弘明集》、《法苑珠林》等皆载有佛教神异的故事。很显然，借神通异能传道、招徕信徒是早期佛教弘扬佛法、取信于外人的手段之一。而佛图澄道德范世、“风姿详雅”、思想理论学问高深才是其立身的根本，否则仅靠神异之术自饰远祸，如佛调、须菩提、释道安、竺法雅等名僧门徒就未必会不远万里之遥，不惮足涉流沙之苦，而求“诣澄受训”了。佛图澄是有忧患意识，且深怀戒惧、时时处处都很有心机不假，然而，以神异之术取得石氏信任，导化石氏、解救苍生、弘扬佛法才是其根本目的。

为了理清众解分歧原因及探究林公言外之音，我们还需进一步从文本着眼。

二、文本用典用词

“佛图澄与诸石游，林公曰：‘澄以石虎为海鸥鸟。’”本条目仅以十八字记言论事，内涵却很丰富，同时林公以喻作评也给读者准确理解林公之意造成了困难。而肇

端之源应是刘孝标注引《庄子》对“海鸥鸟”典故的解释：

海上之人好鸥者，每旦之海上，从鸥游，鸥之至者数百而不止。其父曰：“吾闻鸥鸟从汝游，取来玩之。”明日之海上，鸥舞而不下。^⑩

以及《宋书》六十七卷谢灵运《山居赋》云：

“抚鸥而悦豫。”其自注：“庄周云：海人有机心，鸥鸟舞而不下。今无害彼之心，各说豫于林池也。”^⑪

细加推敲，这里的海人有机变衰玩之心，而鸥鸟则有机悟、机敏之心。支道林正是看到二者皆有机心，才有感而发妙语之评。

值得玩味的是，编撰者用词也给我们探究林公言外之音以启示。一个“游”字，用词颇为讲究，单纯解释为交往、结交也能圆通，但似乎不达撰者深旨。其实，“与”字作动词时本身就可解释为交往、友好、亲近之意，如：

孰能相与于无相与，相与于无相为？^⑫

公先与百姓而藏其兵。^⑬

若仅表达交往、友好、亲近之意，去掉“游”字，岂不更简洁省事？可见，“游”字也当另有深意。按刘辰翁和萧艾的说法，显然是直接套用了刘注中“吾闻鸥鸟从汝游”中“游”的意思，似乎又近于班固《汉书·高帝求贤诏》中刘邦的诏令所用“游”字的用法及语气，如：

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⑭

将刘邦诏文之“游”解释为“玩儿”，与上句“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的语气切合，有狎昵、不庄重的倾向。然而，佛图澄是佛界泰斗、得道高僧，解释成“玩儿”，恐怕有些牵强。笔者认为撰者刘义庆此处用“游”字是基于当时玄学家们对庄子“逍遥”义的注解之风，而且支道林本人又是对《庄子》研究颇深的玄学家。《世说新语·文学》第三十二则就载：

庄子逍遥篇，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马寺中，将冯太常共语，因及逍遥。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后遂用支理。^⑮

这样用词在上下文语境的前后照应中，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因而，此处“游”字可理解为“佛图澄与石勒、石虎交往得心应手、随心所欲”。至于何人持此观点，或许是时人，或许是《世说新语》撰者刘义庆，而支道林的看法却另出一辙，让人云里雾里，玄而又玄。但可以肯定的是《世说新语》撰者将其置于言语篇奉为经典，恰恰能说明支道林评论澄公一事话外有音，其见地深得时人的认可，乃玄妙之门。下面我们再从林公所设比喻着手，分析一下林公的本意。

三、支道林的本意探究

支道林之评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既看到了佛图澄与

石氏二者皆有机心，又能深刻体会到佛图澄的艰难处境。他以《庄子》中海人与鸥鸟的关系来比喻佛图澄与石氏的关系，实质就含蓄地说明了佛图澄欲弘大法之不易，以道化勒更难。海人与鸥鸟之间有着一道天堑鸿沟，人一旦有害彼之心，鸥鸟就会察觉远离。同理，在支道林眼里，以凶残杀戮为名的石氏也当为“异类”，他们与慈悲为怀、戒杀戮的佛门中人也有着天然的隔阂。佛图澄若有异心，石氏也会察觉，与鸥鸟不同的是，石氏一旦察觉就会加害于佛图澄。所以，支道林之意强调的是佛图澄与石氏交往关系十分艰难，佛图澄除了小心翼翼应付之外，还需极其巧妙艺术地把握彼此之间的分寸、力度与距离。

事实也正如我们所分析，在佛图澄的主动努力之下，他们之间保持着一种十分微妙的关系。他们心照不宣，且各有机心。

佛图澄于晋永嘉四年来到洛阳，其根本目的是弘扬佛法。他在跟凶狠如豺狼的石勒、石虎交往中处处皆见机心。以在战乱频仍、生灵涂炭的苦难现实中救民于水火，《高僧传》载：

白云：再到闾宾受诲名师，西域咸称得道。以晋怀帝永嘉四年（310年）来适洛阳，志弘大法。^⑯又说：

时石勒屯兵葛陂，专以杀戮为威，沙门遇害者甚众。澄悯念苍生，欲以道化勒，于是杖策到军门。^⑰

据材料知，佛图澄是自己主动杖策到军门欲弘扬佛法，所以，说其“清静无机心”、“无心应物”是不确切的。慧皎《义解论》载：“经云：‘若欲建立正法，则亲近国王。’”博学多通、见多识广的佛图澄对这样的道理自然是知晓的。然如何能被石勒所重？自造其门，盖为下策。他于是先投奔大将军郭黑略处，帮其出谋划策，然后将其作为了亲近王室的敲门砖。《晋书》载：

澄投勒大将军郭黑略家，黑略每从勒征伐，辄豫克胜负，勒疑而问曰：“孤不觉卿有出众智谋，而每知军行吉凶，何也？”黑略曰：“将军天挺神武，幽灵所助，有一沙门智术非常，云将军当略有区夏，已应为师。臣前后所白，皆其言也。”勒召澄，试以道术。澄即取钵盛水，烧香咒之，须臾钵中生青莲花，光色曜日，勒由此信之。^⑱

此外，佛图澄极富机心的一面还表现在他与石氏皇族交往中尽力不介入他们的政治斗争，如《晋书》云：

勒僭称赵天王，行皇帝事，敬澄弥笃。时石葱将叛，澄诫勒曰：“今年葱中有虫，食必害人，可令百姓无食葱也。”勒班告境内，慎无食葱。俄而石葱果走。勒益重之，事必咨而后行，号曰大和尚。^⑲

澄以隐语暗示大将石葱谋反，或许是因无确凿的证据而不明确告密给石勒，但以这样隐晦的方式与政治斗争保持距离，既彰显了预见的神异，受到石勒尊重，又避免了卷入政治风波而引火烧身。再如石虎僭位后，太子谋逆的事件及石虎二子相残事件（事见《高僧传》及《晋书》），佛图澄也以隐语暗示石虎，给自己避免过深介入政治漩涡留下了较为安全的生存空间。

然而，石氏也并非没有机心。佛图澄正是看到他的

机心，才借郭黑略之口传达自己的“预言”——石勒能拥有华夏，这无疑给外族石勒入主中原以信心，为其建立政权提供了一种新鲜而玄虚的理论依据，这当然是正中石勒下怀了。石虎继石勒之位后，因当时信佛之人很多，寺庙也很多，但同时“真伪混淆，多生衍过”，中书著作郎王度认为，佛是外国神灵，与民无功，贵为天子，不应信佛。这是严于夷夏之防的看法。石虎也是夷人，他并不同意王度的说法，下书反驳云：

朕生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④

显然，石氏亲近佛教正是欲在儒家的传统之外，为他们当皇帝找一个理论支柱，也是颇见机心的。

由此可见，支道林借比喻来描述佛石之间的交往关系，就是欲强调佛图澄与石氏交往，其处境十分艰难。而正是在艰难的处境中，佛图澄看穿了石氏的机心，于百般努力之下才维系了一种微妙关系。

返回来再看，刘辰翁的“玩虎于掌中耳”和萧艾所解“把石虎当作海鸥鸟狎玩”，是忽视了佛图澄与石勒、石虎交往的艰难。须知，石勒、石虎可并非我们想象中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一介武夫！魏收《魏书》本传曰：

勒壮健，有胆略，好骑射，周蜀朱每使代己督摄部胡，部胡爱信之。^⑤

又《世说新语》言语第七则云：

石勒不知书，使人读《汉书》。闻酈食其劝立六国后，刻印将授之，大惊曰：“此法当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⑥

由以上材料可知，石勒有“胆”有“略”，实乃雄勇而有智谋的枭雄，尽管不识字，但喜好文学，王仲荦先生评论其曰：

他对历史事件有自己的看法，凭着他的丰富的政治经验，评论历代帝王的是非得失，往往使听者叹服。^⑦

这说明他又极富判别能力，再加上他与石虎皆以杀戮为名，狎玩这样的人无异于玩火自焚。实际上，佛图澄也并没有狎玩石氏的本心，他劝石勒“悯念苍生”，劝石虎“佛法不杀”，体现了一代高僧崇高的品格，是一种大境界。他当时弟子众多，信徒如影追随，眼线卧底不乏其人，再加上他的道法异术高明，若要巧妙除掉石勒、石虎也不是没有可能，但他是道德范世的高僧，没有也不屑于这么做。

所以说，支道林以佛学家和玄学家的双重身份，对佛图澄在与石氏交往中的艰难之处体悟非常深刻，也非常到位。这大概就是《世说新语》撰者将其置于言语一门奉为经典的缘故吧。下面再谈谈佛图澄与石氏交往关系的意义及影响。

四、佛、石关系成为高僧与世俗统治者交往的典范

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前期，鲜有僧人与世俗统治者交往甚密的情况。这样，高僧们的传教活动较为单调：理论上多译经书；实践活动流于下层。而西晋末期，佛教该如何发展壮大，是佛教高僧面临的、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佛图澄于晋永嘉四年来到洛阳，因“志弘大法”、

“悯念苍生，欲以道化勒”之故，于是年近八十高龄的佛图澄主动“杖策到军门”。这是佛教与国家统治结合的滥觞，而佛图澄与石氏兄弟的结交，也成为了后来高僧与世俗统治者交往的典范。

如果说佛教能在东土扎根立足，除了玄学之风对其有推波助澜作用及鸠摩罗什等翻译大师译出大量佛经，二者使佛教理论大著中土外，不可不承认的是佛图澄与石氏政权的结交，为其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并为佛教取得正统、合法的社会地位而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迈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首先最为直接的影响是佛、石关系成了这一时期可供效仿的典范，一时之间，蔚然成风。例如：在升平元年（357）前燕慕容俊派兵攻河南，道安投奔东晋疆界内的襄阳途中，行至新野时，他提出了佛教发展的措施：

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⑧

而道安在襄阳潜心佛事，他的事业受到社会各界乃至皇帝的褒奖，晋武帝曾下诏曰：

俸给一同王公。^⑨

他的功德同样也引起了前秦君王苻坚的重视，除遣使给道安许多尊贵佛像，甚至不惜以武力延致道安。再如：支遁是东晋名僧，他和皇帝的关系也很密切，《高僧传》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方立天先生《魏晋南北朝佛教》评论说：

支遁受到东晋最高统治者的重视，晋哀帝即位后曾不断派遣使节，召请他赴京都建康，在东安寺讲《道行般若经》。帝王带头推崇佛教，支遁全力配合，宣扬佛法，为封建统治者效劳。^⑩

又如：鸠摩罗什誉满西域，名震东土，引起了前秦苻坚政权的注意。前秦建元十八年（382），苻坚派大将吕光率兵七万西征，出发前，苻坚嘱吕光：

朕闻西国有鸠摩罗什，深解法相，善闲阴阳，为后学宗，朕甚思之。贤哲者，国之大宝。若克龟兹，即驰驿送什。^⑪

长安后秦政权建立后，姚萇闻罗什之名，请罗什到秦，但后凉吕氏不放，怕罗什的智谋为秦所用，于己不利。姚兴即位后于后秦弘始三年（401），发兵攻败后凉，才迫使后凉罗什入长安。姚兴积极扶持和发展佛教，并视罗什为国师。

虽然这些世俗的统治者视高僧为“神器”，也不乏积极扶持佛教者，但是，我们并不能简单认为他们都是彻头彻尾真心崇信佛教的信徒。从相关史料可以看出：苻坚不惜以武力延请道安目的之一是“以辅朕躬”；姚兴与后凉吕隆争夺罗什，吕氏父子不放罗什是因“什智计多解、恐为姚谋”；姚兴夺得罗什也实为政治统治的需要计，否则就不会有逼令罗什纳妓女十人的事了。由这些史实看来，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前期，许多高僧对于统治者的推崇、利用政策应有切身的体会，因此也就顺势迎合，有时也迫于强权淫威才配合统治者，而佛图澄利用与石氏政权结合的便利机会，弘扬佛教、广传佛法，无疑给后来高僧与世俗统治者交往起了典范作用。

五、对僧官制与保护民众生命及扩大佛教势力皆有影响

中国僧官制度的产生虽是一个逐步酝酿的过程，但

到佛图澄时,他和他的弟子们的宗教活动,在“僧制自制”到“僧官制度”的过渡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佛图澄的尊显地位实为僧官制的端倪。

佛图澄主动杖策到军门志弘大法,在经过一番精心策划与辛苦的努力下,得到了后赵石氏政权的支持和敬重,如《晋书》所载:

下书衣澄以绫锦,乘以雕辇,朝会之日,引之升殿,常侍以下悉助举舆,太子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众坐皆起,以彰其尊。又使司空李农旦夕亲问,其太子诸公五日一朝,尊敬莫与为比。^①

佛图澄地位尊显的程度令人咋舌,“衣以绫锦,乘以雕辇”外,竟然“常侍以下悉助举舆,太子诸公扶翼而上”,九五之尊的皇帝也不过如此吧!然细想之,天不能有二日,国不能有二主,佛图澄被尊称为“大和尚”实际上已不仅单纯是这些戎酋们尊崇的佛教领袖,而且成为了后赵政权的军政顾问。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说:

各国君主通过赐与僧团领袖爵禄的形式,笼络宗教领袖,力图使僧团置于政权的统治之下。如石勒、石虎优宠佛图澄、封其为“大和尚”。前秦苻坚在迎请道安到长安后赐其“国师”号。这些由封建君主敕封的佛教领袖,已成为日后僧官的前身。^②

所以,佛图澄的尊显地位实为僧官制的端倪。石勒、石虎当政时期,皆以暴虐滥杀著称,佛图澄决定劝其扬善弃恶。他对石勒说:

王者德化洽于宇内,则四灵表瑞。政弊道消,则彗孛见于上。^③

对于佛图澄的劝说,石勒欣然接受,使不少人免遭屠戮,《高僧传》本传载:

凡应被诛余残,蒙其益者十有八九。^④

佛图澄同样也劝石虎戒杀行善,每遇石虎问其佛法时,他皆以“不杀”对答。他向石虎指出:

帝王之事佛,当在心体恭心顺,显畅三宝,不为暴虐,不害无辜。至于凶愚无赖,非化所迁,有罪不得不杀,有恶不得不刑。但当杀可杀,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杀害非罪,虽复倾财事法,无解殃祸。愿陛下省欲兴慈,广及一切,则佛教永隆,福祚方远。^⑤

这里,佛图澄以灵活变通的“佛法不杀”教义规劝石虎,实际上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高僧传》本传云:“虎虽不能尽从,而为益不少。”^⑥

纵观整个魏晋时期,战乱频仍、政权交替,各民族之间的矛盾,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矛盾异常尖锐。在动乱的格局中,人民大众始终是天灾人祸的最大受害者,在水深火热的苦难现实中无法也无能为力改变自身困境时,他们在精神上渴求得到解脱,而佛教提倡的不留恋、不执着、追求来世、把希望寄托在禅定和成佛上的思想给人们在精神上找到了出路。自佛图澄得到后赵统治者信奉与尊崇以后,赵国一切民人皆可信仰佛教出家。这是中国历史上统治者第一次明令汉人可以出家^⑦。除了

修建大量的寺庙外,这为弘扬佛教教义,信徒蜂拥皈依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社会各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高僧传》载:

戎貊之徒,先不识法,闻澄神验,皆遥向礼拜。并不言而化焉。^⑧

又说:

民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⑨

由此可见,佛图澄的尊显地位实为僧官制的端倪,他受到后赵统治者尊崇之后,抓住机会保护了不少民众的生命,并且在扩大佛教的势力方面也作出了贡献。

综上所述,林公曰:“澄以石虎为海鸥鸟。”一句意蕴深藏,其弦外之音、言外之旨体现了支道林以佛学家和玄学家的眼光,将佛图澄与石虎之交往关系的体察准确到位。而就是在佛图澄的主动努力之下,这种艰难、微妙的关系,成了这一时期高僧依附于世俗统治者的典范。致使佛教曾一度受到皇权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少数民族统治者出于落后民族的一种自卑心理,他们对外来文化佛教普遍有着一种认同的亲切感,积极扶植佛教,给佛教发展带来了空前的生机。

(责任编辑:無邑)

①①①②③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9—90、89—90、184、328页。

②杨勇:《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94页。

③徐震堉:《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8页。

④《世说新语词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57页。

⑤萧艾:《白话世说新语》,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1991年,第28页。

⑥张永言:《“海鸥鸟”解》,《汉语研究》1994年第3期。

⑦Arthur F. Wright, “Fo-tu-teng: A Biograph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No. 11, 1984, 3—4.

⑧⑨⑩⑪⑫⑬[唐]房玄龄等:《晋书》卷95《僧涉传》、《鸠摩罗什传》、《昙曜传》、《佛图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497、2502、2502、2485、2487、2487页。

⑭[梁]沈约:《宋书》卷67《谢灵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64页。

⑮曹础基:《庄子浅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82页。

⑯黎翔凤:《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50页。

⑰[汉]班固撰,王先谦补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5页。

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45、345、352、178、181、50、346、346、351、351、351、352页。

㉗[北齐]魏收:《魏书》卷95《石勒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047页。

㉘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45页。

㉙方立天:《魏晋南北朝佛教》,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8页。

㉚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04页。

㉛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2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46页。